

文化与传统之殇： 对俄国现代化历史和道路的哲学思考

张建华

内容提要：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俄国现代化是在内部缺乏充足的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同时面临强烈的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启动的，因此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经济现代化先行而政治现代化相对滞后的曲折道路，甚至经常出现断裂甚至停滞的险象。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统发挥了巨大的制约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文化特质持续性地发挥其滞后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文化特点使其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专制制度，文化传统，现代化类型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 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近代俄国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既波澜壮阔，又谜团纷纭的图式：这里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追赶西欧的大规模改革，也有历史发展的停滞与困惑；这里有叶卡特琳娜二世“温文尔雅”面纱遮掩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有农奴制度下的惨无人道和专横暴虐；这里有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卓著成就，也有落后的边远城镇与低矮的农舍与其并存；这里有现代化历史性的跃进，也有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断裂。

而苏联 70 余年的发展则为现当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最鲜活的资源：这里有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诞生，也有旧体制和旧势力的殊死反扑；这里有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执着探索，也有人们对一成不变的斯大林模式的困惑；这里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有赫鲁晓夫式的急躁冒进之虞；这里有苏联经济赶超式的历史性跃进，也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不前；这里有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也有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大厦呼喇喇倾覆之痛。

在俄国（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西方文化时常闪现的旧影，更看到了俄国传统与文化拖曳的主线。那么，西方文化传统与俄国文化传统之于俄国（苏联）近现代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发挥何种作用呢？

一、西方文化：俄国现代化的制动器和催化剂

自 18 世纪初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始，年轻的俄国知识界就开始思考着一个重要而且重大的问题：俄国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俄国应该走西方式道路，还是走东方式道路？这个“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整整困扰着俄国知识界三个多世纪之久。21 世纪初，新俄罗斯又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他所说的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

[1] (P. 22) 于是，新俄罗斯的知识界不得不再次困扰于这一历史谜团。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到近代发展成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后来又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经典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乃至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该文化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它为专制黑暗的俄国带来了启蒙的曙光，以先进的思想启迪一代代革命者，同时也警示了专制统治者，从而推动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

俄国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有五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公元 10 世纪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将基督教（希腊正教）传入俄国；第二次高潮为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依照西方的经济、文化模式进行的大规模改革；第三次高潮是 19 世纪 20—70 年代，即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及实践；第四次高潮是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第五次高潮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执政开始的俄罗斯“重返欧洲”进程。

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首先皈依了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而后诏令全国，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强迫市民去第聂伯河里接受洗礼。基督教会（东正教会）一入俄国，几乎立即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它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基督教传入俄国，首开俄国引进西方文化之先河，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加速了俄国封建制度的发展。

17 世纪末，彼得一世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了那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倡导和主持了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彼得一世改革的贡献在于通过强制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因袭封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1812 年战争后，十二月党人彼斯特列尔远赴法国，亲身体验到那里的民主气氛，看到了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欧的差别，他宣布：“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2] (P. 4) 十二月党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专制黑暗的俄国传播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以自由的鲜血和牺牲唤醒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者。

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和巴枯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在思想和理论上又比十二月党人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能够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层层束缚，大胆地到西方文化中寻找改造俄国社会的理论，把民主思想作为一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丑陋和黑暗，热情地呼唤着人民革命。

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诞生意味俄国几代革命者在近一个世纪的苦苦探寻后，终于在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理论成功地应用于俄国革命实践，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了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取得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选择“重返（或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政治取向，它仍然试图从西方寻找新出路。在俄罗斯出现了大西洋——欧洲主义派，也可以称为新西欧派。政界的代表人物有盖达尔、科济列夫、亚夫林斯基等人。他们的主张归结为一点，即俄罗斯应该彻底抛弃苏联遗产，甚至彻底抛弃东方遗产，完全仿效西欧，融入西欧，回归西欧。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即俄罗斯科学院士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文化起源于欧洲，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的，尽管俄国曾经被蒙古鞑靼人统治了两个多世纪，但“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3](P.21)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根源深植于北欧的斯堪第纳维亚文化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文化，而斯堪第纳维亚文化对于古罗斯的影响尤其大，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即斯堪第纳维亚（Сканденавия）

加上斯拉夫(Славяне)。

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一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这导致我们没有能力去和解与对话，最后，没有可能起码做到有节制、采用合乎理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4]

而在 160 余年前，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早就写下了同样的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5] (P. 43)

为什么在俄国历史上能出现数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的现象呢？

首先，从地理因素方面看，俄国虽然为内陆国家，但却身处欧洲中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带上，这为西欧先进文明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彼得一世以及后继者一直在为“出海口而战”，最终使俄国成为濒海的国家，使俄国有了眺望西方的窗口，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传播。

其次，从西方文化的借鉴和传播者方面分析，俄国的统治阶级和革命者在内心深处都存有对西方文化的原始认同感。俄国的统治阶级的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在心理上大都依属西方文化，当俄罗斯国家出现危机或他们个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自然地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基督教，在精神上统一俄罗斯；彼得一世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接受启蒙思想，倡导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标榜民主，自称为“自由主义者”，都是巧妙地把西方思想、文化变成适应俄国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但也在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俄罗斯的先进知识分子多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很多人又都曾长期旅居欧洲，亲身体会了西方文明和民主的气氛，他们怀着对专制制度的无比憎恨，对自由生活的极度渴望，把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作为启迪民智和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有力武器。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俄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三，从俄罗斯文化形成的特点和结构方面看，俄罗斯文化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俄罗斯文化本身是在融合多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体，结构多元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西方文化又曾经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之一，因此后者自然对前者拥有内在的亲合力。西方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及融合过程。俄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从事另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即改造旧文化，建构新文化。

西方先进文化对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文化是俄国（苏联）现代化发展的制动器和催化剂。因为传统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势的旧体制中挣脱出来，即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要来自外界客观的冲击和震荡，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正是这一作用。

二、历史反观：俄国文化传统拖曳的阴影

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族心态、政治倾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式是民族文化的最重要内容。当这种文化被赋予历史性和继承性后，即被称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进化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曾经给予了该民族各方面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第五章中，我们探讨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以及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文化传统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合物，它在本质上是专制集权主义的，在形态上却是多元开放的，这看起来似乎颇为矛盾，但在俄国却结合得极为和谐。由此便衍生出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两个特点：观念超前与影响滞后。

观念超前是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在形态上的多元、开放特性密切相关的，它使俄罗斯文化传统易于接受外来的思想。立国之初，俄罗斯人便颇为主动地接受了异邦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文明，从而为俄罗斯文化增添了最重要的内容。几乎是与法国革命爆发同时，俄国的贵族思想家拉吉舍夫就在俄国掀起了思想启蒙的大旗，他用“民主”和“自由”的透视镜“整整向前看了一百年。”十二月党人在远征巴黎之后，在惊奇和感叹之后，把更实际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带回了俄国。从俄国统治者方面看，彼得一世应该算得上真正地睁开眼睛看西方的俄罗斯人，“农奴主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了孟德斯鸠、伏尔泰思想的“忠实信徒”，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自命为“自由”的庇护者，声称“朕将致力于赐国家以自由，从而防止它再度沦为疯子手中的玩物。”[6] (P. 135) 20世纪初的自由派贵族人物、大臣会议主席（即西方所称的俄国第一位总理大臣）维特也认识到“必须明智地限制独裁，必须在康庄大道上筑起几堵限制独裁之墙，这看来是当今世界人类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7] (P. 245) 如果深究其原因，这其中除了归结于俄国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祥地——西欧相邻的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外，不能不特别指出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兼容性和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开放性的重要作用，即俄国社会的两极——封建统治者和革命者都在心理上归属于西方，习惯于在俄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和答案。但是，封建统治者和革命者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便于统治，在民主和改革的旗号下维持专制君主统治；后者则是为了推翻前者的统治，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理想，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统治者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能够较为明智地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和自身处境，选择时机以推行改革，以达到延续自身统治的目的，从而或多或少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革命者则运用新思想启迪民智、发动人民大众，敦促统治者推行改革或谋求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

观念超前是实施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和有利的因素，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就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在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上超前的人物，他们往往被称为社会的“精英”，他们是现代化的推动者，他们基本上都是由现存政权和制度的反对者组成，在俄国，这个角色却是由现存政权的统治者和革命者均担了。俄国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和革命者的素质和决心。因此现代化的后来者在从事现代化事业时，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以现代化先行者的先进文化为借鉴，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些长期经历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面对现代化的召唤和先进文化的挑战时，更应采取这种开放务实的健康姿态。

“影响滞后”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有着顽强的再生性和延续性。因为民族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使同时被赋予顽强的再生性，其影响将在该民族的进化过程中一再地发挥出来，一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在适宜的时机还会以某种方式迁移和滋生，这即是文化传统强烈的滞后作用。这种滞后作用常常以民族心态、价值观念、政治倾向等具有广泛的民族性的东西反映出来，使人们难以从根本上予以克服。它在封建历史漫长、专制主义政治传统浓厚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英国、法国那样有着人人参与民主和人人平等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家里，近代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发展就迅速而广泛，而在专制主义文化传统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艰难而曲折。

统治俄国三百余年之久的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让人民失望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取代，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建立，都为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的历史条件。但是推翻专制制度和临时政府，只是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阶段性任务，新的历史使命正等待着布尔什维克，那就是不断推动政治现代化，以求最终完成政治现代化。苏联现代化进程可以被看成是俄国现代化的继续，但是无论是在领导者（即布尔什维克党）方面，还是在现代化的性质（即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与俄国现代化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俄国这样一个有着数百年专制制度统治历史、有着极其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摧毁了沙皇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但是历史实践表明，旧的统治体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但历史传统却难以在短时期内“打碎”。人们常常把“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的概念混为一谈，认为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后，就意味着拥有了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百倍”的民主。然而民主革命只是民主建设的决定性步骤，而非全部内容。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仅仅标志着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一样，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建立也仅仅意味着该过程的继续。因为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在民主建设过程中还要努力克服旧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努力清除封建文化传统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惰性影响。特别是苏维埃新政权的各级领导者更应该自觉抵制封建思想的影响，把民主建设的任务放在工作的首位。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非常重视民主与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列宁告诫全党：要加强布尔什维克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修养，自觉抵御封建思想的侵袭，因为苏维埃的国家机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这个“旧式”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旧”的管理经验、“旧”的管理机构和“旧”的管理人员等方面，它需要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地增加“新”——社会主义的内容。特别是在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的前提下，完成这个过程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列宁在规划未来的政治制度时，曾满怀信心地宣布：民主将属于全体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他宣布未来的国家政体形式将是议会合一的苏维埃。苏维埃是全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8]（P. 249）即人民民主的“直接政权”；国体是多党联合执政制度，参加苏维埃的各政党和平竞争、相互监督，由人民自主从中选择执政党，并坚持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多数党派掌握政权的原则。在这里列宁精心设计了一个多党联合参政、议政、执政，以苏维埃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体制，不难看出列宁吸取了资产阶级多党制的优点，然而又强调由广大人民自主选择执政党，从而防止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狭隘性和虚伪性。但遗憾的是，苏联的政治发展最终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最终形成了缺乏民主的斯大林政治体制。斯大林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高度集权和缺乏民主。在社会生活方面，斯大林主义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苏联人的心理状态和道德面貌。在政治生活方面，官僚主义、个人迷信、宗派主义等许多封建的东西得以泛滥。在经济生活方面表现为生产管理方式的僵化，生产者劳动积极性下降，贪污腐化风气横行。

纵观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理由说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是苏联一党制和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因此布尔什维克作为俄国革命最后的普罗米修斯，它的历史使命是重大和艰巨的，特别是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更加艰巨。但是苏联社会主义的70年历史中时常显现的消极文化传统的阴影以及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证明了文化传统的“影响滞后”的特点。甚至俄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专制制度

的掘墓人——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在民主政权和民主文化的建设方面也难以摆脱文化传统的影响。

三、世纪叹息：俄国现代化在路上！

如果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算起，到1917年2月的俄罗斯帝国的覆亡，到1991年12月的红色帝国——苏联的解体，到今天仍奋进在现代化道路之上的新俄罗斯，俄国现代化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盛与衰和兴与废，经历了历史传统的困顿与徘徊，也经历了现代化的警醒与超越。

我们在考察了俄国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之后，不禁促人掩卷思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兴盛，一种文化的诞生；看到了黑暗与自封，也看到了光明与奋进。

历史文化传统(或称传统文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一种历史遗产。它凝结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记载着人类社会走过的伟大道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厚重的旧时代、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印迹。一味肯定、因袭文化传统，则会走上因循守旧以至狭隘民族主义的道路，一味否定、排斥文化传统，则难免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沼。每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民族和个体的人在为现代化目标奋进努力的同时，都肩负着冲破文化传统束缚的重任，因为他们不仅要超过传统，而且要超越自身。当然我们并非是提倡对各民族文化传统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因为在这些文化传统中无不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辉。对待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扬弃”，即肯定和继承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积极成分，并且弘扬光大，否定和抛弃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和消极成分，使古老的文化传统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肯定与否定、继承与抛弃、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都是一对对矛盾关系的统一体，这些关系处理得好，文化传统即能为现代化提供许多有益的东西，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反之，一味因袭旧的传统、固步自封则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

俄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难以逾越的发展阶段，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意味着告别中世纪的愚昧，迎接现代文明，告别封建的专制制度，迎接人类的自由民主。回避现代化，即是抗拒社会进步，却步历史潮流，则必将被历史所遗弃。现代化是一个艰难、曲折和长期的过程，它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方能达到最终目的。因为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必然受到旧的、传统的、历史的、积习的势力的阻碍和反扑，而且为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还要克服自身思想和行动中与其奋斗的事业相悖的观念和行为的惰性影响。尤其是在曾经一度落后于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里，现代化的历程就更加曲折，因为他们要克服的困难太多，要走的路更长，而且有可能还要接受“血与火”的先进文明的洗礼，为此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必须协调同步发展。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使各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这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每一个进行着现代化的国家和在为现代化事业奋斗的人们，要充分认清协调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地为现代化健康、稳步、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否则两者关系失调，会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以至反复。

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国再一次陷入“路标”迷失的境地，陷入现代化停滞状态，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再次陷入反思之中。当代历史学家马斯拉科夫写道：“对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研究永远是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永远在祖国历史学中占据显著位置。这合乎历史的规律，即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大转折和面临道路选择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一个复杂和充满希望的时期，俄罗斯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第三个千年的大门槛，社会将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向？国家将变成什么样？等待它的是经济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还是新的混乱和崩溃？这个问题困扰着

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 [9] (P.3) 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就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这导致我们没有能力去和解与对话，最后，没有可能起码做到有节制、采用合乎理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4]

俄罗斯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政治家的思考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普京^①在 1999 年 12 月 30 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强调：“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200-300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窘境，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脑力、体力及道德力量。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建设性工作。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认清危险程度，能否团结起来，能否承担起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90 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抽象公式和模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也是没有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顺利，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0]

答案是明确的：对于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来说，现代化可以救俄国，但俄国现代化仍然在路上！

[参考文献]

- [1][美]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2] 孙成木. 俄国通史简编：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 [俄]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 俄罗斯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J]. 哲学问题. 莫斯科：1996(6)
- [5][俄] 恰达耶夫. 哲学书简[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 [6] 张建华. 俄国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 [俄] 维特.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 [8][苏] 列宁全集：第 3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9] [俄] 马克拉科夫. 20 世纪历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无法结束的争论[M]. 叶卡捷琳娜：1999.
- [10] [俄] 普京.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 独立报[J]. 莫斯科：1999 年 12 月 30 日

^① 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理，第二天即 12 月 31 日 17 时 50 分，被辞去总统职务的叶利钦任命为代总统。2000 年 3 月正式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